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4/PV.19
11 October 1989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第十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10月4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加巴先生	（尼日利亚）
嗣后：	萨拉赫先生（副主席）	（冈比亚）
嗣后：	加巴先生（主席）	（尼日利亚）
嗣后：	弗罗尔森先生（副主席）	（挪威）

—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莫布图·西塞·塞可先生的讲话。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代表发了言：

哈尼鲍松先生	（冰岛）
黄根成先生	（新加坡）
法尔先生	（塞内加尔）
阿克先生	（科特迪瓦）
卡费先生	（科摩罗）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9-64198/A

下午3点20分开会

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莫布图·西塞·塞可元帅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扎伊尔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莫布图·西塞·塞可元帅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以大会的名义荣幸地欢迎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莫布图·西塞·塞可元帅阁下莅临联合国，并邀请他在大会上讲话。

塞可总统（以法语发言）：1973年10月4日，也就是16年前的今天，我第一次在大会上讲话。 从那以来，当时面临的许多局势现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当我在这一讲坛上第二次发言时，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告诉大家，我很高兴能够当众阐明我对影响到人类未来的一些当代问题的看法。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主席。 我非常感谢本组织全体会员国不仅对你本人和你的国家，而且对非洲给予的信任和荣誉，非洲理所当然地为此感到自豪。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阿根廷代表团团长丹特·卡普托先生表示祝贺，他干练地主持了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工作。 我还要对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表示特殊的敬意，他的才干帮助本组织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在这一方面，事实表明，南半球国家有能力为促成指导世界事务的决策作出有益贡献。

扎伊尔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联合国在我国独立之后不久为恢复和平和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而发挥的关键作用，当时，这一和平和统一因我们视为悲剧事态的刚果危机的国际化而受到威胁。

还有整整十一年，20世纪即将结束。 这不仅仅是从一个世纪走向另一个世纪的简单事情，这是跨越两个千年，人的一生很少会遇到这种事情。 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如此的幸运，能够感到走过了一个一个千年。

然而，既使上帝的旨意仍然深不可测，既使人们搞不清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仍然有一件事情是必然的：世界上的少数国家，亦即目前６０亿人口中的６．８３亿亿居民，令人羡慕地垄断了技术、进步和发展，而对这些技术、进步和发展，全世界人民都曾作出贡献。 这就是为什么我带给大会的发自非洲心底的信息首先是和平的信息和对各国人民团结的呼吁，同时还有对保护我们环境的请求，因为只有保护环境，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其曙光的２１世纪才能够成为一个进步和共同幸福的世纪。

我请求大家允许我简单地谈一谈我对１６年前阐述的一些问题的考虑，这些问题特别涉及到和平和国际经济秩序。 大家当会记得，那时我曾谴责在非洲土地上殖民状态和种族隔离的持续存在，我还曾讲到，在历史的飓风到来之前，果实必然会最终掉落下来，不论成熟与否，也不论人们是否作好准备。

因此，我们看到了葡萄牙被迫放弃了它们在非洲的殖民地，英国在前南罗得西亚把权力交给了黑人多数。 种族隔离继续践踏着全人类的良知。 但非洲和世界已经设法动员起来，铲除种族隔离，黑人、白人、混合种人和印地安人在同一个民主国家中享有同样的权力和自由的局面已经为时不远。

随着这一信念的加强，尽管某些举动还将会引起一些可以预见的反应，我同意在我国首先于１９８８年10月、其后又在今年８月分别接待了前总统博塔和他的继任德克勒克。 这两次会晤使我得以向我的对话者就那些自由和尊严受到践踏的人的事业发出呼吁，并强调了必须立即铲除种族隔离。 此外，非洲统一组织种族隔离问题特设委员会最近在哈拉雷宣布了在某些条件下同比勒陀利亚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原则，显示了开明的态度和诚意。

关于纳米比亚这个非洲大陆上最后一个殖民主义堡垒，由于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民族主义者的坚定态度，同时由于国际社会坚持不懈地对南非施加压力，它已经坚定地走上了独立的道路。

大会当会记得，作为与埃及团结的明证，扎伊尔共和国以我本人为代表，就

以色列占领埃及部分领土，在这一崇高的讲台上宣布了同那个希伯来国家断绝外交关系。 1982年，按照戴维营协议，西奈半岛归还了埃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恢复了同特拉维夫的外交关系。

这意味着，这一立场使扎伊尔共和能够提醒我们的以色列朋友，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有权拥有安全的国际保证的边界的话，那么他们必须也要承认被迫流离失所40多年的巴勒斯坦人的同样的权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现在再也不能互不理采了。它们必须坐在一起，在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基础上缔造和平。

在亚洲大陆上，越南已经取得上民族统一，朝鲜人民正在开拓对话的道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柬埔寨各方领导人在巴黎举行的磋商虽前景难以预料，确使柬埔寨人民寄予希望，磋商第一轮的失败不应使我们丧失信心。

在16年的时间中，非洲大陆又出现了许多紧张的温床：乍得、西撒哈拉、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苏丹、安哥拉、莫桑比克、布隆迪、布基纳法索和马里，以及最近的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

我们的大陆绝对不需要任何武装冲突。我们大陆渴求和平与发展。所以我们十分欢迎一些紧张根源得以缓和以及其他紧张根源正在缓和，这应归功于有关各方的对话以及共同采取的行动。这进一步证明了非洲人的成熟及其和平解决争端的能力。

关于远离非洲大陆的阿富汗问题，我们鼓励已经实施的任何单方或协调一致的倡议。关于两伊冲突，我们欢迎已经实现的停火，并赞赏秘书长所采取的神圣和有效的步骤。

我们同样希望摆脱了外国影响的黎巴嫩能够再次找到民族和解的途径，并在其勤劳和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丰富传统的基础之上有所建树。为此，我们支持阿拉伯联盟三方委员会的工作。

关于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问题，在我第一次在联大发表讲话时我曾经要求世界各国扪心自问，归根结底，是否是穷国使富国变富的。

今天我认为，反应是明确的。现在已经没人怀疑通过偿付债务以及其他渠道所进行的资金转让损害了穷国。

我们同样关注保护环境以及扎伊尔共和国荣幸地提出的《世界大自然宪章》的问题。但是，这并未使某些工业化国家停止肆无忌惮地把非洲大陆变为有毒废品的倾卸场，我们称这些废物为“死亡的产物”。

这些简单的回顾表明在过去16年中，尽管出现了一些紧张根源，但国际气候还是有了巨大的改善。但只要某些关键问题仍然在危害世界的平衡，上述一切就有受损害的危险。我们在此谈的是和平、发展以及环境问题。

在我们的时代，人类已经拥有确保世界性发展的人力和物力。但还有一些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仍然远远落后，尽管它们有着巨大的自然资源潜力。

两个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阻碍着我们经济的发展与增长的所有努力：巨大的外债负担和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这些问题，但我在此强调的是外债负担问题。

外债负但对我们非洲国家来说正扼杀着我们的经济。但对我们的债权国来说，非洲各国欠它们的2 300亿美元同纽约股票交易所仅在1987年10月一次的股票暴跌中的损失来比只是沧海一粟。

例如在扎伊尔，在1987年债务重新安排之前，我们偿还的外债占我们出口收入的26%和国家预算的50%。我们那时已经不可能拿出最低限度的社会性开支或者是进行我们所急需的基础设施投资。

尽管债务已经重新安排，但债务负担仍然因累计利息的增加而增长，迫使我们更多地借债。

不过我们还是欣赏在多伦多首脑会议之前加拿大所作出的姿态，以及在多伦多首脑会议之后法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所作出的姿态。

最近，比利时采取了革新的措施，它不仅取消了非洲国家所欠的公债，和吸收了扎伊尔的三分之一的商业债务，而且剩下的三分之二的商业债务重新安排在25年之内偿还，并有14年的宽限期。

此外，对这三分之二商业债务的利率将转变成一笔当地货币的基金，以资助债务国中的发展项目。

在此，我还愿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敬意，她自1973年以来一直为了其非洲伙伴包括扎伊尔的益处，谨慎地采取各种措施以减轻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并将各种信贷变为当地货币，以便资助当地的双边合作项目。

尽管有这些旨在减轻债务负担的慷慨措施，但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却未达到，主要是因为贸易条件恶化对我们经济的极为严重的影响，这削弱了我们偿付债务的能力并减少了为我们发展提供资金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非洲大陆在下个世纪的共同合作中必须能够显示出尊严。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必须有新的政策出现，以便减少外债负担，并在各个合作伙伴之间恢复信心并加强发展合作。我们在此谈论的是有关道德及正义的问题。

我们，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一直向我们的伙伴要求的不是否认偿付债务的需要，而是重新安排暂缓期限，并现实地延长我们的偿付期并在考虑到我们现实的偿付能力的情况下同各方重新商定利率。

但是，二十世纪即将进入最后十年，因此，现在难道不是以更具新意的办法解决债务问题的时候了吗？在一些国家已经树立的合作榜样指导下，国际社会应敦促非洲的债权方接受宽限期至少十年的原则，并同意所有债务用当地货币偿还。因此而获得的资金将投入全国发展基金，而这些基金反过来又会用于资助有可能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公共与私人投资项目。

这样做，我们的债权方——即国家、商业银行和多国公司——就不会消极地等待自己放出的债务得到偿还，而是在声援的基础上参加恢复我们经济的增长。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和加强富裕国家和我们发展中国家之间国际关系中的缓和与相互信任的气氛。

我借此机会回顾一下，大会专门讨论非洲经济复苏与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结束时通过的《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与发展行动纲领》包括了两个相互补充的义务。 第一，非洲国家有义务进行经济改革，第二，国际社会对

支持非洲的努力作出承诺。在通过那一纲领之前不久，一些非洲国家，包括扎伊尔共和国已开始了经济政策的改革，目的是促进迅速复苏并为持续发展打下基础。这些措施所造成的影响一般都造成了社会紧张和政治不稳定，这就更加证明这种决心是大胆的，值得赞扬。

尽管作出了牺牲，这些结构调整措施所取得的结果微乎其微，无法持久或根本就不存在。事实上，正如秘书长就对该纲领的实施进行中期审查而向大会第四十三届常会提交的报告所证实的那样，我们的情况更为恶化。

由于上述原因，我向国际社会的良知发出下列呼吁：从１９９０年起，让我们根据我刚才大致描述的办法，制定一个有利于非洲发展的真正的国际声援计划，一个类似于为重建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欧洲而实施的《马歇尔计划》的计划。

正是在这一构架内，我建议非洲各国在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９年的十年中用本国货币偿还所有债务，同时在与有关的国际机构合作下，将因此而获得的新的资源完全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非洲乘着已经开始的改革的东风，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并利用最近采取的行动所取得的结果，非洲将做好充分准备,解决国内的种种限制， 积极地作为一个真正的经济伙伴参加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从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上占据一个有尊严的席位。

然而，非洲经济发展首先需要一种和平、自由与安全的气氛。 非洲认为自己是任何旨在实现世界和平的进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大陆的每一个国家都感到自己有责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致力于维护国内外的和平。

在这方面，同整个国际社会一样，我已经满意地注意到了近年来在裁军与减少武装冲突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是通过促进美利坚合众国与苏联之间签署的华盛顿条约而开始的缓和所取得的进展。

但是，这种从根本上讲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紧急局势缓和所造成的气氛也必须导致在发展领域取得国际社会所期望的结果。大会知道，从独立之日起，我国扎伊尔就一直不得不努力平息内战和旨在分裂的战争。从这些战争的灰烬中缔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 近二十四年来，扎伊尔人民一直生活在和平与民族和睦中。扎伊尔共和国从自己对非洲和平的承诺出发，同自己的邻国卢旺达和布隆迪一道，建立了一个经济声援区，这一经济声援区现在已迅速成为非洲次大陆的一个安全与稳定区。

为了维护和平，我国已两度向乍得伸出援助之手，第一次是应非洲统一组织的要求，第二次是对合法的乍得政府的呼吁作出反应，目的都是为了捍卫该国的领土完整。扎伊尔共和国及其东南方的邻国赞比亚为实现和平的理想作出不懈的努力，在经过七年的谈判之后，已签署了一项条约，将过去未明确定界、因而自１８９４年以来一直成为一个争端根源的共同的边界的一部分定界。

扎伊尔同九个邻国分享着９１１６公里的边界，其中与安哥拉的边界是2600多公里。这表明我们愿意看到那个曾遭受１４年的战争蹂躏的兄弟国家恢复和平。因此，在我的同事、中非和南部非洲各国国家首脑于今年5月１６日在卢安达聚会时授权我担负斡旋使命时，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在这方面，我不无困难地设法于１９８９年6月２２日组织了巴多利特首脑会议，有２０个非洲国家参加了那次会议，其中包括１８位国家元首和２位级别甚高的代表团团长。

那一天，非洲看到为安哥拉未来的和平奠定了基础，即，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同安盟领导人萨文比作了历史性的握手；宣布停火；确定旨在实现民族和解的谈判的原则。

就我而言，我认为，安哥拉人依然是这一已经开始的和平进程的唯一主人。不论他们以何种方式共同工作，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只有安哥拉人自己有权解决影响到他们国家的政治和军事问题。

国际社会注意到，如果说对巴多利特宣言所规定的停火只有短暂的遵守——主要是由于心理原因加上外来干涉，但我们的安哥拉弟兄并没有放弃对话，相反他们与调停人一起连续进行了四次会议。

我仍然坚信，安哥拉人民所明确表达的对恢复和平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将压倒目前的困难。全面执行布拉柴维尔与纽约四方协议，成功地实施安理会有关纳米比亚独立的第435(1978)号决议以及南部非洲和平与正义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安哥拉内部的民族和解。我请国际社会尽一切能力确保非洲和安哥拉的和平努力得以成功。我们作为调停人比以往更有决心，向我们的安哥拉弟兄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并向他们提供我们微薄的经验。

和平、安全及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形成一个人们能自由发展的空间，在安宁的环境和充分确保其权力的情况下进行参与。我们非洲人对自传统社会时期以来基本自由所占的地位是熟悉的，它的痕迹今天仍然存在，尽管殖民主义大国曾想要消除这些痕迹。我们的祖先献身于自由的思想，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在各个地方以特别勇猛，坚定的方式反对任何外来征服的企图。

我们非洲人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是明确我们目前建立的政治机构是否确实有助于自由的充分发展。并不是因为西方正在把这一点强加于我们，民主并不仅仅是西方社会所垄断的，而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寻求可能为我们提供发展的政治与经济战略。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现代的非洲社会再也不用为争取民主或争取更多的民主而进行努力。相反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的一些政治结构是适合于非洲男女并有助于实现我们各国社会一体化的真正的民主基础。

扎伊尔正在努力以我们自己的特色制定并坚持人权。这是我们的关键利益和最关切的事项。据此我们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并批准了两个有关公民和政治权利及有关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国际公约。我国是本组织40个已经批准了有关公民与政治权力的任择议定书的成员国之一。我国还自愿地加入了非洲人权宪章。最后，我国政府中有一个部门负责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个部门有为完成其史命

而进行干预的全面权利。如此建立的机构表现出我们促进扎伊尔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及选择居住在我国的外国人的权利的政治决心。

这一部门虽然建立时间不长，但经验表明它在向公民提供信息使他们充分了解其权利和自由方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一些个人的权利遭到不正当的侵犯并无法通过其他机构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部门就进行干预并弥补所造成的损害。这一部门为遭受拘留的人确保程序、条件和得到恰当的待遇。

扎伊尔欢迎今年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它表示的敬意，由于扎伊尔在人权领域内所取得的成绩已经在那时的会议上不再排列在被认为是不尊重人权的国家名单之上。当然，我们承认我们做得还不理想，但世界上所有国家，甚至是最先进的国家在涉及到个人权利的问题上也不能免受批评，这一事实充分表明我们不能根据偶尔注意到的一次政府方面的失职或一些警员的违反就把一个法治的国家与那些将镇压作为政府体制的国家混为一谈。

最后，我想提醒大家注意有关环境的问题。我激动地回想起曾亲眼目睹的我们的河流的壮观和溪水的清晰。我也回想起我们的原始森林的茂盛，每天早晨都能听见鸟的呼唤。今天我们悲哀的看到，我们的自然环境由于遭到多次、一再的侵略而在加速恶化。输出有毒废料在全世界引起的愤怒和抗议表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看到了人类由于生活质量的下降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大气污染是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因此，扎伊尔迫切要求在这方面制定严格的国际准则，以便为人类的未来而保护我们的地球。

我国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表现在我国积极支持执行世界自然宪章。

扎伊尔共和国境内有47% 的热带非洲雨林，扎伊尔有5% 的国土受到国家保护。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个数字提高到16%即领土内大约三十七万六千二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以保护濒临灭绝的一些物种。其中有白色犀牛。犀牛的总数从1980年的11头增加到1989年的25头。我们还要确保对霍加坡的保护，在一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地区对霍加坡所进行的部分研究表明其密度是每2平方公里有1只。关于大

象，扎伊尔的森林和热带草原共拥有占全部非洲七十万头大象中的将近二十万头。

我在这里向所有已采取行动竭止象牙贸易的国家表示敬意，象牙贸易是大象灭绝的主要原因。我们对生活在与邻国卢旺达接壤的山区的大猩猩也感到忧虑，已故的受人怀念的福西夫人就是为大猩猩而献出了生命。

各会员国都同我一样认为，在人类争取和平、安宁的生活及全面的发展的时候，一切有损生态平衡的进步都是有毁于人类本身的。

最后，我希望今天国际关系中的缓和气氛会变得更加浓厚，并且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给我们带来各国人民之间更多的和平和团结。

在我们看来，国际社会对于非洲问题必须采取一种真正团结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在这方面存在许多偏见，他使我们停留在欠发达状态。

所以，对于非洲的债务问题，我提出一个新的办法：把我们所有的债务都兑换成当地货币，并建立其发展资金，来资助重点投资。这意味着创造条件使非洲能够担负起自身的发展，并且以更多的尊严进入二十一世纪。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世界和平对于非洲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我强调我我国在非洲，特别是在安哥拉恢复和平而作出的努力。

还必须承认，人权和自由是任何人类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至于我们本身，我已经介绍了我们为了增进和保护这些权利和自由而设计和建造了机制体系。

最后，我还回顾了国际社会对大自然所承担的义务。保护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且我也介绍扎伊尔在这方面作出的贡献。

作为我们联合国组织基础的、我们全体自愿服从的各项原则是崇高的。他们反映了我们对于和平与自由，以及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的尊严和生活改善的共同关注。尊重我们共同关注的这些目标是人类美好未来的最好保障。

祝愿二十一世纪能够实现我们团结、公正、和平与进步的希望。

主席：我代表联合国大会，感谢扎伊尔共和国总统所做的重要发言。

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先生在陪同下离开会议厅。*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哈尼 鲍 松先生（冰岛）（以英语发言）：我同前几位发言人一起祝贺我们的主席被选举主持我们本届联大会议。 这证明了大会对他的敬慕，而且也表明了对于他作为其杰出代表的尼日利亚这个伟大国家的尊重。

作为同其邻国远隔重洋的岛国上的居民，冰岛人可能比多数国家的人民都更敏锐地感受到，在世界事务中距离已经是一个越来越不重要的因素。 在技术、经济和环境等许多层次上，国际社会中日益密切的联系已经变得很明显。 所以，世界各国人民日益认识到人类利益的普遍性和共同命运。 有人曾发明了“全球村”这一词来描述这个趋势。 一个来自航海国家的人会有另一种说法：我们是同舟共济的。

过去曾属于各别国家特权的那些问题的全球化不仅仅是历史的必然。有意识的政治行为也发挥了作用。 东西方关系正在发生的深远变化，例如最近在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的双边对话，向我们表明有效的政治导向确实可以改变现状。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国际关系的新纪元，他为从根本上改变战后时期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开避了现实的前景。 为了成功地把握当前这个过渡时期，就必须有政治意愿和想象力，规划出国际关系的新的道路，同时适当考虑到涉及的风险和意外。

---

* 副主席萨拉赫先生（冈比亚）主持会议。

为克服东西方关系中的猜疑和不信任而做出的努力增进了一种气氛，现在有可能在这种气氛中把资源从昂贵的军事竞争转向更富有创造性的国际事业中。 所以，东西方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无疑也会有利于南北关系。

我赞扬秘书长为解决严重的国际和区域冲突，因而增强联合国的作用和形象而做出的宝贵贡献。

加强联合国的地位意味着在国际关系中实行法治。 对于一个在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中没有使用暴力的、没有武装的国家来说，国际社会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法治观念是特别值得欢迎的。

变化中的世界环境为联合国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一个冷战心理的消退，联合国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现实地希望把《联合国宪章》中所体现的理想变为现实。同时，联合国本身也已经成为一个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变革的机构。

可以把我们今天活着的人看作是这个星球上的过客。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有义务保护我们祖先的共同遗产，并保障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条件。

冰岛是一个其生存主要依靠对海洋资源开发的国家。对冰岛人来说，保护环境是不折不扣的生与死的问题。

我们感谢国际上众多领域中出现的倡议：有关保护臭氧层、远距离越界污染以及最近关于有害废料越界转移的倡议。两年前我们在本机构中欢迎以我的北欧朋友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这份报告分析了环境的状况并为未来的行动提出了建议。今年，我们开始了将于1992年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筹备工作。

这些倡议响应了一个对国际社会来说日益明显的需要。在工业化世界中，我们正看到我们所创造的文明的肮脏的后院－ － 不管是在陆上、海上或是在大气层。我们大家，特别是发展中世界，越来越明显地感到，不减少贫困并同时保护环境，今后我们就无法取得经济增长。

我们正目睹全球变暖、温室效应、热带雨林遭到破坏、森林消失、酸雨、沙漠化和臭氧层减损的影响。

需要提醒地球上各大陆的居民，海洋覆盖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积。海洋现在和将来将继续是地球上生命的基本来源。因此，对我们冰岛人民来说，维护海洋的自然资源将一直是优先的。正如我们的冰岛语所说："Foourland vort halft er hafio"——即海洋是我们祖国的一半。

海洋生物的资源可被认为是世界的食物储存。因此，对于海洋日益严重的污染，首先是由放射性和工业国家把公海当作它们工业废料倾倒场所的作法引起的污染，是不仅沿岸国，而且整个世界社会感到震惊的主要原因。

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态发展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可能造成的甚至更大，实际上是灾难性的破坏作比较。我们只需回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使用这些武器造成的破坏。

将自己封上"人类"美名的本地球上的统治物种出于贪婪和短见看来不仅准备无视其行为对其自己生境造成的后果，而且也实际参与对大自然的全面战争——甚至准备完全破坏大自然。

我对布伦特兰报告中所作的悲观的估计感到震惊，该报告提到每年有六百万公顷有生产力的干地变成没有价值的沙漠，每年有一千一百万公顷的森林遭到破坏。三十年来，这种破坏扩大到分别和沙特阿拉伯与印度一样大小的陆地面积。报告警告我们，环境趋势很可能急剧改变本星球并危及星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物种。

我们面对这些对我们地球的袭击是否束手无策？我说"不"——并且从我刚才提到的倡议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基础是对共同努力保护我们星球的法律义务的承认。这些义务可以追溯到管理我们本机构工作的《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宪章》的普遍原则规定人类和各国政府坚定承诺不污染我们的星球，也不毫不怜悯地开发我们的自然资源。《宪章》规定了具有道德和伦理性质的责任。我们过去、目前和将来的活动是一个完整的生态整体。《圣经》提醒我们种豆得豆。

大会已通过规定某些有关原则的决议；其中一项决议是通过《世界大自然宪章》的1982年的决议。我们看到本机构赞同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结束时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原则。我也注意到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第55条。

世界大家庭在1982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第12部分包括有关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原则。布伦特兰委员会得出结论说：

> “各国为了海洋总受威胁的支持生命系统的利益而采取的最重要的初步行动是批准《海洋法公约》”。(A/42/427，附件，第十章，第55段)。

《世界大自然宪章》的24条原则中包括尊重大自然和不损害地球的遗传生存力的义务。《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规定，在战争中注意保护自然环境，防止大规模、长期和无法弥补的破坏。向布伦特兰委员会提出报告的一些法律专家提出了一系列法律原则，例如，声称所有人类拥有对他们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足够的环境的基本权利。

但是，我们能够在《海洋法公约》中寻找我们在保护环境领域中进一步努力的灵感。我国和许多发展中世界的人民感到自豪的是，当我们开始为这一海洋环境宪章进行长期斗争时我们走在时代的前头。我们在《公约》中可以找到通过各国间全球和区域水平上的合作保护和捍卫环境的义务。我们发现在这方面限制倾倒和污染大气层是特别恰当的。

冰岛政府认为，现有的保护环境的法律文件应当得到加强。现在有各种保护环境具体领域中的法律文件。但需要有新的文件，例如在气候变化方面。应当探索新的领域。例如我们欢迎马耳他建议在大会议程中列入一个有关对领土外空间的环境保护的新项目的倡议。

但是，我们也认为，我们在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时可以从起草《海洋法公约》中吸取经验。应当起草一份新的简洁的法律文件，规定普遍适用于保护环境所有领域的各国的权利和义务。这些原则应当涉及所人类对一个安全的环境的权利以及保

护自然资源和维护生物多样化和规定在最佳可维持产量原则基础上利用自然资源的义务。这些原则将呼吁为环境估价和各国在保护环境时进行合作的义务规定标准。

大会本身应当表明其对这一领域的承诺，通过在其自己的赞助下或与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会议的筹备工作一道采取必要的步骤，为这样一项新的法律文件作准备。

挪威著名国际法专家廷斯·埃文森—— 国际法院的一位法官—— 提醒我们说，“好的星球不容易找到”。 我们应当认识到并谦卑地承认，我们不仅应当相互和平共处，而且还应当与大地和平共处。

中欧和东欧为实现更大的经济和政治自由进行的改革比以前预料的更快，更彻底。 事态发展，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的事态发展已证明，中欧和东欧国家现在似乎有了一种现实前景，能够抛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强加给它们的一种政治和经济制度。 历史已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它们的文化和传统，并非常不利于它们的经济进步。

这些事态发展是建立改善东西方关系基础的一个重大因素。 但是必须认识到，东欧内部变化不可能孤立产生； 内部是否能够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反应。

因此，中欧和东欧目前的事态发展需要得到鼓励。 它们应当被看作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用以改变东西方关系，建立欧洲持久和平的新基础，这种新基础将更加重视政治安排，而不是军事安排。

现在在东西方关系中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任何时期都要小，因此，军备控制和裁军进入了考虑的中心阶段。 但是，军备控制不应当被认为可以取代东西方议程上所有问题取得的真正进展，这一议程当然包括人方面的问题。一月份结束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维也纳后续会议上取得的全面成果已帮助摆正了该议程与安全有关各方面问题的位置。

然而，毫无疑问，军备控制方面取得的进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过安全领域范围。早日结束目前欧安会主持的维也纳欧洲常规部队谈判和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将给人们带来特别的希望。 就消除目前常规武器方面不均衡现象达成协议将消除东西方紧张关系根本原因之一，并促进欧洲政治关系的改变。

美国和苏联已宣布愿意停止生产并销毁贮存的化学武器，它们的这一愿望也极大地促进了大幅度有意义裁军的前景。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欢迎布什总统一星期前向大会提出的建议和苏联的积极反应。

与关于欧洲常规武器和建立信任谈判一样，削减大量核武器也同样是在改善东西方关系方面所作的一个尝试。 过去为我们提供的指导是，如果不能控制核武器方面的竞争，那么合作时代就不可能到来。

消除中程核力量的《条约》强有力地表明，大量削减核武器有利于加强安全的目的。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欢迎最近在消除阻碍缔结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障碍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批准《级限禁试条约》以及在缔结和平核爆炸条约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实现全面禁试条约目标的必要一步。

冰岛政府已表示，一旦目前的欧洲谈判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建立信任和军备控制应当被扩大到海洋方面。 虽然有好几个条约适用于海洋领域，但到目前为止海洋在裁军谈判中还没有得到重视。 海上军备竞赛显然应该引起人们的更大重视，以便创造一个更安全的海洋环境。

因此，我们欢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不仅陆地上，而且海洋上也同样需要加强稳定、提高预见性以及增强信任。 越来越多的人还理解到，海上建立信任必须符合航行自由的原则，并且考虑到不同的国家对海洋和安全海洋通讯线路的不对称依赖。

战略武器会谈提供了大量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前景，包括削减海上的战略核武器。我们认为，应当把大量非战略海军核武器作为包括海洋地区在内的建立信任和裁军

进程中的一个主题加以考虑。

安全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正变得越来越密切。 依靠海洋生物资源的国家应当认真对待海洋环境的污染问题。 苏联核潜艇多次发生事故使我们想到这种事故可能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如果这种事故是在象我国周围那样重要的捕鱼水域中发生，那么后果将尤其严重。 因此，我们建议国际原子能机构首先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制订国际海上反应堆安全指导方针。 这些指导方针应当适用于所有船只。

我已论证，环境问题将是联合国在未来几十年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但是，即使我们接受了新的任务，承担了新的责任，我们仍然需要联合国在和平解决区域冲突方面进行斡旋。

中东局势以及和平解决阿以冲突仍然是国际社会主要关心的问题。 只要有关各方不采取暴力行动，并表现出实现持久和平的诚意，就能够找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以色列关于在被占领土举行选举的计划是寻求解决这一冲突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们特别欢迎并支持埃及穆巴拉克总统最近向大会提出的关于进行这种选举的十点计划。 埃及为人们带来了对话的希望，这种对话将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停止在街头进行的冲突，坐到谈判桌旁来。

我们欢迎阿拉伯联盟为实现黎巴嫩停火所作的建设性努力。 保证该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持久解决办法必须包括所有外国军队撤走。 扣押和绑架人质是不可容忍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行为。

广泛编纂人权方面的法律并逐步发展人权是联合国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联合国已成功地增加了国际协议的数量和范围。 它在这一领域中的最新成就是，起草将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得到审议的关于儿童权利的公约。

尽管联合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违反人权事件的频繁发生及其严重性使人感到非常痛心。 显然，制订准则还不够； 我们必须通过国际行动使政府和个人遵守这些准则，我们必须对所有那些违反人权的人施加更大的压力。

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是加强联合国的执行措施和实施能力。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知识。必须让每一个人了解他的基本人权。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根据《宪章》的精神，任何国家都不能声称，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干涉国家内政。

我前面提到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法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这方面，冰岛政府欢迎继不结盟运动的“海牙宣言”后，把“国际法宣言”议程项目列入本届大会议程。我们注意到，“海牙宣言中提到了许多法治原则；正如我今天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原则应当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指南。

大约八百年前，冰岛议会通过了法治原则，以指导新建立的共和国中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这条原则——LLEGIBUS GENES SUNT MODERANDAE——被刻在联合国大会上使用多年的小木槌上。我们相信，在我们现在正跨入的合作时代中，国际社会将让这条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

黄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主席。你作为军人、政治领袖、学者、作家所具有的独特和杰出的背景，以及你在多边外交中的广泛经验，无疑为你提供了指导我们完成联合国议程上各项复杂任务所必需的特殊敏感性和技巧。我国代表团对你的能力绝对放心。我们向你保证充分合作。

我也祝贺罗纳德·施皮尔斯先生被任名为副秘书长，负责政治和大会事务及秘书处服务工作。我相信，他会给他的工作带来最优良的职业品质，这也是他前任的特点。也允许我正式表示，我们赞扬丹特·M·卡普托先生阁下在上届会议期间如此勤勤恳恳、令人钦佩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去年一年对联合国来说格外顺利。国际社会长期目睹战争、争端与冲突不断爆发，从来没有象去年那样看到和平的希望如此接近于实现。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协定达成了，伊朗、伊拉克之间也建立了停火。在十二月还达成协定，在纳米比亚开始了独立过渡进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肯定了它对维持和平的贡献。多边外交硕果累累。联合国的威望空前高涨。

在今年１９８９年，我们却不能那么兴高采烈。解决各国间冲突所遇到的现实与困难使我们清醒过来。虽然在几条战线上已经取得一些进展，我们仍然清楚地认识到在和平道路上依然存在着问题。在苏联部队从阿富汗撤走八个月之后，交战与屠杀并没有减少。结束两伊冲突的会谈陷入了僵局。我们震惊地看到黎巴嫩局势恶化，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尽管在早些取得进展，却裹足不前，甚至倒退。我们还在万分关切地等待着早就应该实现的纳米比亚独立。

新加坡感到荣幸的是，我们通过参加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警察部队，能够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贡献。我们感到荣幸的是，我们警察部队的首脑LEE KOK LEONG警察长被任命为监督纳米比亚选举的首席选举官员。但是，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南非企图阻挠安全理事会第４３５（１９７８）号中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方案中某些关键内容的执行。我们应继续保持警惕，决不让任何事情破坏和平过渡进程，阻止11月份自由、公正选举的全面落实。在纳米比亚之后，国际社会应当帮助加快南非根本改革的步伐，结束可恨和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联合国组织工作报告中总结维持和平问题时指出："我完全清楚地认识到，通向公正和持久解决的道路常常困难重重，面临顽固的抵抗"。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如果在这方面有任何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和平没有捷径可走。

当一个主要大国认识到不能用军事力量实现政治目的，同一个全球性对手进行对话比对抗更富有成效的时候，世界就出现了一个较有利的国际气候。然而，我们在今年清楚地看到，既使大国愿意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这只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还不是全部条件。在区域冲突中能打开和平大门的钥匙常常掌握在直接有关各方的手中。只要有一方不灵活、不妥协，和平进程就会受阻。

我们还认识到，既使在我们加倍努力解决国际和地区冲突的同时，一代新的问题又摆到我们的议程上，迫使我们紧迫地给予注意，这些问题是毒品、环境、难民和债务等问题。这些问题跨越国界；如果对它们放任自流，可能给国际社会更为广泛和长期的安全以及我们星球和平的努力带来问题与威胁。

在东南亚各国中，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做的不错。我们之所以取得进展，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稳定，使得我们这些国家能集中精力处理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等问题。这反过来又加强了东南亚的活力和联贯性。我们曾希望印度支那能够取得同样和平、稳定的条件；但不幸的是，柬埔寨冲突依然是一项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越南于１９７８年圣诞节那天入侵柬埔寨后，柬埔寨问题于１９７９年１月首次提到安全理事会审议，到现在已有１１年。

十年来，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决议，要求越南停止对柬埔寨的占领，接受一项能为那一地区带来持久和平的全面政治解决。这样一个全面政治解决将要求外国军队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撤走，建立一个过渡行政当局，促进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民族和解，以及柬埔寨人民有权在不受外来干涉情况下选择自己的领导人。

我们在联合国的努力并非没有效果。起初越南否认其军队侵略了柬埔寨。后来当这一慌言被揭露后，越南狂妄的声称柬埔寨的形势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由于联合国继续施加的压力和国际上对它的孤立,由于拒绝向越南提供宝贵的援助和投资,越南被迫第一次于１９８６年承认它准备找到政治解决办法。越南未考虑到柬埔寨民族抵抗力量的强大和坚韧。对外国的占领带来的巨大代价使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由于苏联热衷于消减其国外负担，越南继续占领柬埔寨的选择就不能得到保证。越南现在已到了必须重新考虑其战略的地步。

今年４月５日越南戏剧性地向世界宣布打算在9月底前从柬埔寨撤出其所有军队。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了越南士兵在军用卡车上撤离的照片和报纸报道。这确实是一件重大的新闻事件，但我们作为负责的政府对于这一宣布进行的撤军能说什么呢？我们将推断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就象越南所声称的那样于９月２６日结束了吗？我们将推断柬埔寨问题现在已全部解决了吗？是否进一步需要联合国继续就柬埔寨问题进行辩论和讨论呢？

对所宣布的撤军应注意的最为重要的一点是，　首先，这是在没有适当的全面政治解决办法的情况下进行的单方面撤军。越南军队的撤出并未得到有效核查。我

们无法知道这是否是真正的全面撤军。只有少数新闻记者，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几个观察员和与 洪 森 政权有外交关系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的代表到了金边去观察越南的撤军。这些成份混杂的人不可能忠实地核查目前在柬埔寨是否还有越南军队。实际上，根据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所达成的协议而派遣的联合国技术事实调查组报道说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也难以令人满意的核查越南军队的撤离。柬埔寨的地形，破旧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系统使得难以进行系统的监督与管制。

第二，这是越南第八次声称已将军队撤出柬埔寨。在过去，例如１９８２年７月，１９８３年5月，１９８４年6月，１９８５年4月和１９８６年5月，越南都说它正从柬埔寨撤军；但每一次我们发现这些撤军只不过是军队的轮换。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最近的撤军持怀疑态度。９月２７日的《曼谷邮报》上的一篇文章证明了我们的怀疑。该篇文章报道说一些东欧的提供消息者告诉该报记者，雅克·贝克特先生有一些越南军队留在柬埔寨。

第三，目前仍存在着越南士兵留下来作为洪 森 政权的民兵和定居者这一至关重要问题。越南并未辩驳在柬埔寨存在着越南定居者。　　争论的只是数目问题。越南声称在柬埔寨有八万名越南定居者。西哈努克亲王说有一百三十万名。该地区的一些西方外交官估计数目达到三十万到四十万之间。 定居者的数目问题很重要，因为这决定谁在根据全面政治解决办法进行的有国际监督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中享有投票权，因此也决定谁有权选择柬埔寨政府。

在任何情况下越南都未完全放弃干涉柬埔寨事务的权利。自越南４月５日宣布打算在９月底以前撤军以来，越南在几次发言中都声称如果它感到傀儡政权的生存遭到抵抗游击队的威胁，它将有权向金边派出军队或提供任何其他援助。

因此我们十分怀疑越南是否彻底撤离柬埔寨。但是，即使我们能用大量记实材料证明越南已彻底撤出其军队，我建议联合国仍应该继续就柬埔寨问题进行辩论和讨论。有些人也许会认为联合国的作用应当局限于讨论违背《联合国宪章》问题，对柬埔寨的外国干涉停止后联合国对柬埔寨的关注也应停止。为使大家弄清这一论

点的荒谬性，我想打一个比方：如果南非决定从纳米比亚撤军但仍坚持使温得和克政权成为纳米比亚的唯一政府而不给予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公正的选举中的竞选权利；那么我们会很快谴责南非并宣布由于温得和克政权是外国占领军扶植的因而没有统治纳米比亚的合法权利。

越南企图在柬埔寨所做的恰恰正是如此。在撤离其大部分军队后，它继续坚持要使由外国占领军扶植的洪森政权继续统治柬埔寨。因此巴黎会议失败了。以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三方已被大会和联合国承认为柬埔寨人民的合法代表，在进行由联合国监督的自由，公正和民主的选举之前，他们愿意与洪森先生在临时四方联合政府中分享权力。他们准备允许柬埔寨人民决定谁将成为他们的统治者，这表现了他们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最为根本的原则：即一国人民的自决权永远也不应消除。

越南和洪森先生却反对这一原则，他们宣布洪森先生应该在金边垄断权力，或者接近垄断权力。他们知道这样做将使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民族力量别无他择，只有开始一场军事斗争以保卫其合法的自决权。越南和洪森都想挑起这场内战。我们悲伤的看到已遭受将近二十年痛苦的柬埔寨人民继续生活在痛苦中。但是这一事态应由越南和洪森先生负责，他们应当因此而受谴责。*

在过去十多年里我们通过我们的原则和道德立场引起了柬埔寨人民的希望，我们不能在他们很快将获得真正自由这一重要时刻对他们置之不理而使他们失望。联合国能够也应当帮助柬埔寨人民并坚持对柬埔寨问题应当有一个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 国际社会也必须坚持只能接受上述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这一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必须给柬埔寨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的自由、公平和民主的选举中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结束内战并使柬埔寨人民得以再次自由喘息。

---

*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在柬埔寨自决权的行使必须建立在柬埔寨各方民族和解的基础上。所有各方都与柬埔寨的未来生死攸关。企图排除任何一方并以此作为民族和解的先决条件是不现实和不负责任的。这无异于导致冲突和流血的延长。因此西哈努克亲王明智而又现实地要求成立由柬埔寨四方组成的临时四方政府。该政府将负起组织自由和公平选举的责任。由于所有各方将参加组织选举，因此都应受结果约束。

不论我们作为单个的国家怎样看待柬埔寨的任何一方，只有柬埔寨人民拥有决定谁应该或不应该统治柬埔寨的道义和政治权力。其余任何人都没有这一权利。在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行使其自决权的时候，柬埔寨人民最终将得以对红色高棉进行评定和判断。国际社会有义务帮助创造条件使柬埔寨人民自由作出政治选择，无论作出何种选择都应该加以尊重。国际社会应当认识到柬埔寨人民有作出明智选择的才智。

让我重新阐述柬埔寨问题的中心问题。首先，所有越南军队的彻底撤离必须由联合国进行核查，因为只有联合国才能提供有效的国际监督、监查和管制机构。第二，柬埔寨人民必须享有行使自决权的机会，根据《联合国宪章》这是各国人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第三，高棉任何一方都不应被剥夺参加根据全面政治解决办法举行的选举的机会，因为只有柬埔寨人民才有权决定应当由谁管理他们；不应以排除任何一方作为就解决办法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

我国—— 新加坡—— 在历史上与越南并不存在敌对。 但是，为什么新加坡和我们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伙伴在过去１０年里如此大力地支持柬埔寨的事业呢？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和占领威胁了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越南的行动如果不加以否定将成为一个对我们不幸的先例。不能允许越南只是部分解决问题。如果越南获得了成功，那将表明进行侵略是有利可图的。那将对其他国家表明一国可以不受惩罚的侵略另一国，建立一个附庸政权，在足够长的时间后对他所创造的混乱局面一走了之，让抵抗战争的风火猛烈燃烧，然

后一切照常地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那将成为危险的先例。对于国际社会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来说，我们不能接受这一危险的先例。如果这成为被接受的国际行为那将使我们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

在柬埔寨问题方面，联合国取得了成功。这也许听起来自相矛盾，但是它表明国际道义压力确实起作用。由于联合国一年又一年所通过的决议,由于日益增长的支持，我们最终迫使越南改变其立场。我们至今取得了这样的成就。越南通过撤出战场上的军队正在朝解决柬埔寨问题迈出了第一步。但是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我们在联合国必须继续进行道义上的说服，以使越南相信它有责任以有利于柬埔寨人民的公正和持久和平以及有利于区域安全和稳定的方式，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 越南为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作出贡献后，印度支那将恢复和平。印度支那出现和平后，国际社会将帮助其重建。越南将最终得以集中进行自己的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并获取繁荣的果实。

法尔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塞内加尔代表团希望通过我热烈祝贺您，授之无愧地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主席。这是对您和您的国家，尼日利亚—— 我国的朋友—— 授之无愧地赞誉。您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和杰出的外交家的个人品质以及您在联合国系统所获得的丰富经验必定保证我们的工作将成功的进行。

请允许我在此重申我们对您的前任，阿根廷的丹特·卡普托先生的深切感谢，他干练地指导了大会去年会议的辩论。我们也重申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富有才能和献身精神地进行为和平和发展服务以及加强联合国作用的不懈活动。

去年一些受尊敬的人士都在这一论坛上表示非常高兴地看到由于美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关系的改善而带来的对话和理解的新时代。我们非常满意地注意到这一缓和和合作的气氛正在继续并且增长，一些持续恶化长期成为国际

关系一个特点的区域性冲突正在减弱并且为解决这些冲突已取得了巨大进展就证明了这一点。１９８９年４月１日实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开端；安哥拉、古巴和南非的三方协定的签署与实施；非洲为促进安哥拉民族和解而采取的主动行动；阿尔及尔协定的缔结（利比亚和乍得据此最终走上了最后解决其争端遗留问题的道路）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现任主席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目前所做努力提供了机会，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认为非洲大陆上述地区实现和平是有希望的。同样在中美洲，所谓《阿里亚斯计划》所包含的进程由于１９８９年８月７日的特拉协定而得到证实和加强。最近，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已停止了其工作，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我们祝贺那一重要会议的主席，法国和印度尼西亚；我们要求高棉各方以及直接有关各方抓住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以确保实现其声明的柬埔寨和平与民族和解的愿望。大会本届会议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以促进有利于巴黎会议的恢复和结束的条件，并适当考虑民主柬埔寨抵抗力量所提出的现实而又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最后，虽然在塞浦路斯仍持续存在实际困难，我们应当鼓励秘书长在塞浦路斯持续采取的行动。

我们欢迎这一重大的进展，它是直接有关方面表现出政治意愿、以及国际舞台上的其他主要角色—— 首先是大国—— 作出贡献的结果。

近年来显著得到加强的联合国的作用，使其能够在保持这种积极和有力的进程方面，尤其是在通过象正在黎巴嫩、伊朗和伊拉克、安哥拉和纳米比亚进行的那种行动来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责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这种信誉。 在这方面，纳米比亚—— 联合国正在那里执行最广泛的维持和平行动—— 目前的事件，将考验这一世界组织的成熟性。

联合国的作用得到加强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正在平静、真诚和开放的气氛中积极工作的安全理事会的活动，无论何时，安理会总是按照国际形势的需要作出有效的反应。 塞内加尔有幸第二次作为非常任理事国参与这一重要机构的工作，我们两年的任期将在今年年底结束。

在这一特别多事的时期，我国谨慎但却坚定地努力为安理会的各项活动作出积极和一贯的贡献。 我们都承担着维护安理会目前的公众形象的责任，有利的政治气氛使该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不结盟国家与其他成员国一道，在这种气氛中，通过建设性和共同的方法及其捍卫正义事业的决心和团结力量，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

世界局势及联合国的作用这种令人乐观的情景，不应使我们忽视我们仍需做大量工作这一事实：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仍在遭受外国占领；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继续使数百万人成为无辜的受害者；在两伊问题上，尽管炮声已经沉默下来，然而和平的到来仍然缓慢；在阿富汗，《日内瓦协定》仍然没有成为现实；而其他紧张局势的温床却已经出现。

被占领的阿拉伯巴勒斯坦领土上正在恶化的局势，以及在寻求政治解决的努力中所出现的危险的僵局，是中东问题的两个主要特征。 塞内加尔对以色列未能对巴解组织的大胆的主动行动作出任何适当反应而深感遗憾。正如每当法律战胜武力，从而需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压迫和统治的英勇斗争时一样，我国是首先承认新的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之一。 我应当在此重申塞内加尔国家元首迪乌夫先生阁下、以及塞内加尔政府和人民对阿拉法特主席、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以及兄弟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敬意。

鉴于以色列政府未对巴勒斯坦方面采取的建设性立场作出任何积极反应所造成的僵局，穆巴拉克总统提出的十点建议是一个有力的倡议，它将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进程铺平道路。

此时，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劝使以色列遵守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２日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规定，以保证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平民不受以色列占领军的镇压，这些军队正在徒劳地镇压起义。

海湾的局势仍然引起人们的关注。 两伊之间实行停火一年多之后，仍然没有

和平。 塞内加尔呼吁双方在秘书长斡旋下举行的关于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的谈判中，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

作为通用法语国家首脑会议---黎巴嫩也隶属这一组织--- 的现任主席，塞内加尔同样呼吁那些卷入黎巴嫩悲剧的各方全力支持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国王以及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提出的和平倡议，并使这一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恢复和平。

除现有冲突之外，一些紧张的局势很可能爆炸，从而成为世界面临的众多问题的一部分。 奇怪的是，虽然《联合国宪章》为会员国提供了防止和解决冲突的有效手段，然而这种局势却继续存在。

为响应秘书长对此表示的关注，大会在第四十三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预防和消除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争端和局势，以及关于联合国在该领域的作用的宣言》(第43/51 号决议)。

塞内加尔呼吁联合国各主要机构及全体会员国为防止这种冲突采取直接和共同的行动。 《宪章》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法律基础，而该宣言不仅体现了会员国的政治意愿，而且包括这方面必要的方针和建议。

在可以应用这一消除可能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的联合国政策的其他例子中，纳米比亚确实是一个试验品。

在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进程中承担重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在其第435(1978)号决议中采取了保证自由参加使该领土尽快获得独立的选举过程的必要步骤之后，继续在支持秘书长努力方面，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我们有责任为了这一代人和后代人使“纳米比亚行动”获得成功。 因此，我们必须象联合国独立计划要求我们的，那样， 保证组织进行投票， 真正举行选举，选举结果得到核实，条件是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必须在每一阶段核查与政治进程有关的各种措施的公平性和可行性。

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坚定有力的立场，同时还要时刻提高警惕，以确保南非能够认真地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否则的话，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远见卓识、勇敢果断的领导下所做出的种种牺牲很可能会付诸东流，同时，迄今为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进程会再次使人们感到怀疑。 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各成员所做出的无私奉献，国际团结的典范，也会收效甚少,从而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

如果我们能够立场坚定，毫不动摇、提高警惕、坚守承诺，那么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将会很快看到黎明，随之而来的便是自由和独立。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辜负各国人民与政府对联合国的信心，也不会辜负联合国所代表的根本价值，就会欢欣鼓舞地迎接纳米比亚新国家加入联合国这一大家庭。

纳米比亚的局势确实是人们深切关注的问题，但是目前南非的局势令人感到更大的不安，在那里又重新实行了紧急状态，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组织被宣布为非法，新闻受到审查，尽管国际社会呼吁宽容,但政治反对派人士仍然遭到逮捕而不予审判，甚至被判处死刑，同时还组织了基本上是违反民主精神的选举，因为这些选举把黑人多数排斥在外。 现在是比勒陀利亚应该懂得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时候了。南非应该明白它永远也无法阻止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以及反对种族隔离组织为主南非建成一个不分种族、民族平等的社会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确实出现了一些迹象，似乎表明在观念方面已经暂时地出现了一些变化。 在宣称的意愿转换成为行之有效的政策并终止种族隔离制度之前，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并增加我们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压力。 在1989年12月大会召开关于种族隔离特别会议时，我国代表团将会再次谈到这个问题。

国际政治领域中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一些区域冲突也正在平息，和平的希望不断高涨，但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局势却越来越越令人感到不安。 深受其害的主

要是居住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等地区的男女和儿童，他们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现实在许多方面比２５年前更为糟糕。 社会勉强得以维持；人民毫无希望，饱受各种苦难，如饥荒、贫穷和各种自然灾害，沙漠化严重、蝗虫到处蔓延；持续不断的危机给经济带来的严重的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到只是边缘待遇；在有关国际经济局势的决策过程中，这些国家的经济又被排除在外，所有这一切就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严酷现实。

当然，还有些方面可能会给我们一线希望。 例如，将于１９９０年4月召开的特别会议，这是大会关于经济合作的一次会议。还有将于１９９０年9月召开的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巴黎会议，以及将于1991年召开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八届会议。

但是，这些我们的人民曾经寄于希望的会议有多少因为没有获得任何确实成果而令人感到完全灰心丧气？

再过一年半就是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与发展行动纲领制定五周年。 复苏与发展是这项行动纲领的两项主要目标，但是，非洲严重的经济局势还远远没有得到改善。 相反，这一局势正在日益恶化。 正如中期评审所明确表明的那样，人们期望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与开发机构所作出的反应与非洲国家所作出的自我努力与自我限制相比，还十分不相称。

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改善我们的境遇，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团结，共同承担责任。

在另一领域中，二十年前大会通过的官方发展援助的公认国际目标迄今仍然没有得到实现，在专家看来，目前的趋势似乎是朝着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的方向发展。

关于北南资金流动问题，事实上，资金正前所未有地由南方净流入北方，尽管１９８６年5月就在这个地方人们对非洲的局势作出了特别的承诺，这清楚地表明发达的北方与欠发达的南方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问题，即使今天提出一些解决办法，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最终解决也仍然是今后的事情。

我们于１９８７年9月在这个讲坛上讲话的时候，曾经满意地看到一些国家作出决定取消受到危机严重影响的非洲国家的公共债务，或者把这些债务转为赠款。今天，我们十分高兴地欢迎密特朗总统在于达喀尔举行的第三届法语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所宣布的决定，从１９９０年1月１日起取消３５个非洲国家用于发展援助的所有债务。 我国感到十分满意的是此后比利时以及最近意大利所宣布的相似决定。

显然，如果说这些单方面的过渡性措施为接受国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那么同样明显的是，如果要使这些措施完全有效，就应随即采取总体结构措施，而这些措施应当是以债务国为一方，以债权国和国际组织为另一方的多边磋商而产生的结果。

最后，关于困扰南方各国的商品价格问题，这些价格不断下降，使得各国经济变得更加脆弱，而这些国家的经济正在经历结构调整，维持它们在人力和社会资源方面，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世界经济的灰暗景象应当促使我们以更加务实的眼光来看待事务，并使我们在行动中更有纪律性，这需要我们采取真正协调一致的行动，而这一行动的模式可见于其他一些领域中已经实现的基础工作，如裁军、环境、毒品以及国际冲突的解决。

在这几年里对危险的军备竞赛所表明的集体反应；努力争取有效裁军所取得的或正在取得的进展，为保护生态环境而采取的值得赞扬的主动行动，动员每一个人，包括人民和政府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毒品斗争的愿望以及为缓和与解决国际冲突所采取的措施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意愿都表明了世界已经意识到的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的环境是共同所有的，不管其安全、军事、卫生和社会成份以及生态、政治和经济因素有多么不同；第二，需要协调一致地联合起来和平地面对人类的重大挑战。

我们不要搞错。 所有这些挑战，既不是北方国家自己也不是仅仅靠南方国家

就能面对的，这不仅因为污染、毒品、化学武器和其他战略武器不分国界， 应该在世界范围内给予解决，而且还因为每一问题都包含有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根本联系的许多方面。 因此，毒品问题的整个方面反映了经济、卫生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废料问题反映了工业、生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裁军问题表明了安全、和平与发展相互交叉的复杂关系；正如消除不发达的努力必须包括两个方面一样，一方面提供生产奖励，特别是通过增加商品出口收益，另一方面减轻不发达国家的债务负担并改善社会条件。

我们全面看待上述各种问题的关系与相互作用时，必须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真正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是同时对这一系统的所有不同方面采取行动。 我们应该在这一背景下看待１９８９年7月埃及、塞内加尔和委内瑞拉国家首脑和印度总理就重新开始南北对话以及通过经常性的最高级磋商讨论两个半球共同关心的问题所提出的倡议。 这一倡议已经获得了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不结盟国家运动以及在此的几个代表团的支持。 我相信，大会将给予必要的世界支持，以使其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在二十世界末最悲痛的现实中，饥荒无疑是最令人讨厌的，不仅是因为其持续不断，而且因为它的各种表现形式。 确实不可接受的是，在北半球，生产过剩和消费过剩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难以容忍的浪费程度—— 而在其他地区，每过一分钟就有几千人死于饥饿，其中包括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的大量儿童。 对儿童、妇女和老人死于饥饿的忧虑必须永远消除。 这是可能的，事实上，由于我们可以找到办法，这比想象的要容易。

三年前，塞内加尔国家元首阿卜杜·迪乌夫总统阁下接受了当时首次颁发的非洲反饥饿方案领导奖，他提出了建立在本世纪末前在非洲和全世界消灭饥饿的世界阵线的见解。 这一运动，特别是在非洲，是为了制止粮食形势的恶化和对外部资源的日益依赖，维持非洲大陆的生态平衡以及推动创造生产与保护更多的较好合适农作物的新制度。

我代表塞内加尔代表团赞扬带头在本届会议提出建议的国家，这建议是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应该宣布为全世界消灭饥饿的十年。我希望，这一方案将在各国与有关国际机构的积极援助下很快形成，这项十年的计划事实上将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时，在10年内得以实现。

刚才我提到了儿童首先受到饥荒的威胁。虽然饥荒是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这并不是可以看作为违反人类这一脆弱的基本组成部分，即儿童的权利的唯一因素。30年前，为保护儿童，国际社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宣言》。1989年还是国际儿童10周年。我们认为，这一双重的纪念活动给我们提供机会以强调需要建立管理儿童各方面基本权利的合适的法律框架来更好地保护儿童并促进这一珍贵的人力资源的利益。为此，塞内加尔作为共同提案国参与提出成为1988年12月8日第43／112号决议的草案，其中，大会要求人权委员会高度重视关于儿童权利的公约草案并将其提交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非洲根据其文化价值一直支持国际社会促进并保护儿童权利的努力。非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已经提出了许多重大倡议帮助儿童，作为参加1988年非统组织宣布的非洲儿童保护、生存和发展的国际年的活动。

因此，我想重复一遍刚才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国所说的话，即不仅应该在本届大会结束之前通过儿童权利公约草案，而且所有成员国尽快批准这一草案以及随及召开早就应该召开的儿童问题最高级会议。

我已提到了环境与毒品问题。对此，我不想多说了，只是想重申我国政府决心继续在保护环境问题上给予充分的合作。它已经这样做了，今年初在尽可能高的一级上在荷兰参加了国家元首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海牙宣言》；今年在日内瓦建议，环境保护应该包括防止沙漠化和干旱的措施，这是许多国家包括非洲国家的首要问题。同样，达喀尔最近主办了大西洋海洋环境问题和工业废料问题两次重要的部长会议。最后，在我国的倡议下，最近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宣布1990年为非洲环境年。

关于塞内加尔极重视的反对毒品的斗争，我想在这里宣布，塞内加尔国民议会议员目前正在举行特别会议，审议一项法案，这项法案授权我国批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这将使我国成为非洲第一个和世界第二个批准这一条约的国家。

换句话说，塞内加尔全力支持哥伦比亚为同我们时代的这一祸害作斗争而采取的大胆举动，这些举动也得到了其他国家，包括美利坚合众国的支持。 我们同样支持召开一次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国际会议的想法。

最后，我之所以在讲话的后半部分专门讨论改善国际法律秩序的问题—— 各国代表团知道，我们对此怀有同样的信念—— 是因此塞内加尔始终坚决认为法律处于至高无尚的地位。

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满意地指出不结盟国家今年在海牙召开会议庆祝第一届和平大会９０周年纪念时，就国际法的崇高地位得出的结论。

我国把法律的优先地位列为其国内政治制度及其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

在国内，众所周知，我国坚持采取多党民主制，有１７个独立的政治团体和大约２０家报纸和杂志，并建立了公开选举制。

在对外方针上，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危机时期，塞内加尔同其远近伙伴一道，始终把尊重国际法看作是一项神圣的行为准则。 塞内加尔通过我在此时此地重申，它始终坚决地希望尊重并确保尊重国际法，首先是在我们取得独立时确定了我们疆界的那些国际法和确定了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土特征的那些国际法。

阿克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先生，你拥有的众所周知的高尚品质，你对国际事务和对联合国事务的丰富经验，你对和平事业的献身精神，特别是科特迪瓦感到拥有如此之多友谊和合作联系的你的伟大国家—— 尼日利亚对和平事业的献身精神，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衷心欢迎你当选为大会本届会议主席。

请接受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发自内心的兄弟般的祝贺，我们衷心祝愿你不断取

得成功。

我们还要向你的杰出的前任、阿根廷的丹特·卡普托先生表示祝贺，他有效、干练和圆满地指导了大会上届会议的工作。

请允许我最后向我们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特殊的、他当之无愧的敬意，在他长期和丰富多彩的外交生涯中，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促进和维护联合国体现的和平与自由、正义与进步、合作与团结的崇高理想。今天，国际社会已经感受到他的才智、敏锐、坚定、坚忍、以及他的谈判才能和他的说服力，这些使得联合国恢复了信誉，重新成为寻求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的中枢点。我们希望再次向秘书长表明，我们完全相信和无保留地支持他，并相信和支持他为实现这些理想而采取的步骤。

本届大会是在一种平静的国际气氛下召开的，这种气氛受到了两个世界大国的领导人——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过去两年来在信任基础上进行的对话的促进，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一对话对国际政治局势的积极影响。

恐惧和猜疑的坚壁开始坍塌，谈判日益取代对抗和相互争斗，冲突日趋缓和。

因此，我们宽慰和放心地注意到，随着大国承诺尽一切力量在适当的国际管制下消除持续威胁着我们这个渺小星球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核裁军领域已经取得了虽不充分但却意义重大的长足进展。在东西方缓和以解决各种区域或双边冲突、以及在逐步消除迫使人民诉诸武力和暴力以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生活在自由和尊严中的权利的政治压迫方面，同样出现了进展。

但对国际局势的这种多少有些美妙的叙述不应使我们忽略了天边的乌云。如果我们不能显示丰富的想象力，一劳永逸地和平解决各种冲突，并设法结束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和发展中世界的悲惨命运，所有这一切随时都可能消失。

在向大会谈及我国代表团对本届会议的一些主要问题看法之前，我愿再次声明科特迪瓦对联合国和其崇高理想的承诺。我们正努力将这些理想无论是在我们国家还是在世界上都变成现实。

我们忠实于我们和联合国共同信奉的各项原则，但这并不允许我们以任何借口蛊惑人心或放弃我们的尊严。我愿声明：科特迪瓦愿作所有国家的朋友。他明确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以及他们的观点和解决各种问题的途径。其它国家可能与我国不同，但归根结底，这些分歧是次要的，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来努力解决各种问题并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难道科特迪瓦没有权利期待其它国家也采取同样做法、也尊重我们吗？

我们今天正如在过去以及将来一样，是在对和平、完全自由和独立的崇高事业感到关注的驱动下行事的，同时赞赏对话和谈判的益处并坚决反对任何最终会导致暴力和战争的事情。

虽然我们欢迎世界上相互信任的气氛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但我们必须承认，某些局势还使我们严重关注。尤其是在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那里人们争取自决和自由选择自己国家制度的权利常常受到外部干涉，争权夺势和其它国家的虚假友谊的影响和威胁。

在非洲，人们欣慰地注意到，自１９７１年开始我们便建议作为解决所有冲突最好办法的对话今天正在出现进展，并为这一地区的未来打开了广阔前景，这些对话要解决的问题中包括南部非洲令人难以容忍的局势。

关于南非的局势，我们坚决无保留地谴责可憎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理解和支持黑人兄弟为争取尊严权利得到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但我们仍认为，对话与谈判会促进南非社会中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特别是在黑人大多数和白人少数压迫者之间的理解。

显然，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仅仅是淡化或缓和种族隔离政策不会满足南非人民大多数和整个世界人民的要求。因此，我们再次敦促南非当局采取必要措施，立

即在南非为真正的对话创造有利条件，并表现出政治勇气以一劳永逸地消除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因为这一政策阻碍了南非社会的和睦发展，危害了南非与其邻国，与非洲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发展。

为此，他们必须释放纳尔逊·曼德拉，以此切实证明他们决心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因为继续软禁曼德拉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同时还应释放所有政治犯，使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各种运动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力。最后，我们敦促他们与黑人大多数进行对话，把未来的南非建设成为一个所有种族，所有经历和信仰的人都能够在和平、自由和和睦中共同生活的民主平等博爱的南非，使南非的未来能够在一个团结的非洲之中得到保证。

科特迪瓦强烈敦促南非领导人坚决走上这一道路，因为他们国家的和平与合谐正处于危险之中。只有他们才能够为这一必须的对话创造条件，而我们确信，我们的黑人兄弟将是会接受的。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在美国的调停和苏联的谨慎而有效促进下，安哥拉、古巴和南非达成了布拉柴维尔和纽约协议，为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第４３５（１９７８）号决议和促进和平解决安哥拉局势消除了障碍。

我们欢迎这一点。我们希望纳米比亚独立进程将在不再受挫折和恐吓的情况下完成，这样就能够举行一个自由的、正常的民主的选举，使纳米比亚人民最终能赢回其完全的主权，并加入自由国家的行列。

尽管安哥拉兄弟为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进行了多年英勇斗争，遗憾的是，这一国家仍在赢得独立１４年之后仍在进行兄弟残杀并未实现和平。我们欢迎1989年6月２２日的巴多利特宣言，安哥拉各派领导人在宣言中向世界宣布他们决心结束他们的长期内战。

在多年兄弟之间相互冲突之后，民族和解与谈判进程终于为解决乍得和利比亚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可能，这两个国家于１９８８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于1989

年8月31日缔结了阿尔及尔纲领性协议。

因此这两个国家间开始了有利于其两国人民利益的相互理解、容忍、合作和友谊的时代。我们对所有为这一满意结果的出现作出努力的人表示敬意。

关于在东部和南部非洲某些国家的局势，我们欢迎这些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和有关政府愿意与其对手和邻国进行谈判以恢复和平和和谐并促进友好关系的意愿。

在西撒哈拉，联合国秘书长和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的不懈努力使冲突各方在持有保留意见的情况下接受了和平计划。我们对秘书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联合国总部建立了一个技术委员会以最后敲定实施这一和平计划的细节。这一计划应能使西撒哈拉人民通过正常的普选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们对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这两个兄弟国家之间关系的恶化和出现的冲突感到伤心，我们与这两个国家都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无论是在西非经济共同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我们敦促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尽其努力促进两国关系在所有各个方面实现正常化，以利于两国人民以及本地区的和平与合作。

为此，我支持非统组织现任主席为在非统宪章原则基础上和平公正地解决这一冲突所作出的斡旋努力。

其他的紧张局势温床依然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们认为，只要找不到和平和政治办法解决构成问题核心的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势局将依然令人担忧。 为了找到这一解决办法，我们已表示，中东地区出现的任何和平解决要想持久和可行，那就必须考虑到该地区两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以色列的现实和巴勒斯坦的现实。 相互承认这两个现实将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进行对话、从而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创造必要的信任气氛。

我愿借此机会指出，几年以前，我国在这一讲台上第一个表示，不应仅从人道主义的关切和援助对驱赶出自己家园的难民这一角度来考虑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同时也应将这一问题看作实质上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

政治解决办法，以便结束暴力的循环并在该地区恢复和平。

鉴于和平的紧迫性，我们认为，使巴勒斯坦人民享受到公正就意味着对他们的合法愿望作出反应：即自由地行使他们的自决与独立权利并承认他们建立一个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分开与独立的家园的权利，这一地区的国家的生存——包括以色列的生存——将得到保证。

在经过诸多周折之后，情况已发生变化，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有理由希望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将会很快得到实现。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１９８８年于阿尔及尔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这符合我们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主张的符合逻辑的潮流。

我们注意到巴勒斯坦指挥部及其领导人在这方面采取的决定性步骤，他们支持安全理事会的第２４２（１９６７）号决议和第３３８（１９７３）号决议，从而表明了自己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进行对话的意愿。 我们希望，以色列人将打消自己的猜疑，决定同巴勒斯坦人——即他们有一天终将在他们共同居住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和睦共处的人民——进行对话依然是可能的。

因此，科特迪瓦支持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除了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参加之外，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应参加，对总的局势进行估价，并考虑所提出的各种计划，以便在一个十分需要和平的地区给和平一次机会。我们希望，这一会议将有可能取得解决中东局势的全面、公正与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一办法应终止四十多年来在这一地区存在的敌对状态，使以色列有可能将其军队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同时保证以色列国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界内和平生存，同时也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他们在同样安全与得到承认的边境内建立一个自由与独立家园的权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政治与法律的结果。

我们一直并继续在最高级别上同巴解组织及其领导人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保持十分有益的接触。 我们打算继续进行此类接触，以促进中东的和平与和睦。

在寻求实现这一对我们极为宝贵的地区的和平的同时，面对着在黎巴嫩出现的悲剧，我们又怎能不发出愤怒的呼喊。 黎巴嫩人民对他人抱容忍、可交往和机智的态度，由于他们中间四分五裂，导至外国干涉，使他们被盲目的暴力所害，正在死亡。 我们支持关于停止敌对活动和终止正在造成该国生命和基本设施损失的野蛮轰炸的呼吁。 我们支持阿拉伯联盟三方委员会所作的斡旋努力，这些努力的目的是确保停火，黎巴嫩各社区团体——包括所有政党和宗教团体——开始谈判，以便为在实现内部和解的黎巴嫩和平和友好共处奠定基础，从而使黎巴嫩恢复自己的统一、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

最后，我们要强调指出，所有那些具有勇气宣布放弃武力、消除宿怨与仇恨、开始谈判和参加对话，以便终止他们所参与的冲突的交战各方应当得到极大的赞扬。 他们的勇气已使得在寻求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４日的日内瓦协议使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成为可能；这一冲突的最终解决现在取决于签约各方严格遵守协议的条款。

伊朗和伊拉克接受安全理事会１９８７年７月２８日的第５９８（１９８７）号决议和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０日开始实施的停火，这两件事同联合国秘书长进行的斡旋一道，应有助于两国进行直接的对话，以便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使两国有可能实现关系正常化。

我国欢迎中美洲各国签署的和平与合作协议，特别是最近在洪都拉斯的特拉签署的协议。 我们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及其支持集团为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在该地区实现民主与和平所采取的步骤。

我们鼓励两个朝鲜为实现１９７２年７月４日的《板门店宣言》所宣布的和平统一而恢复对话。我们认为，让这两个我们都与之保持极好关系的国家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只有好处，这可有助于双方的对话。我们理所当然地支持双方为此提。出的要求。

我们也支持塞浦路斯两族为恢复该会员国的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并保证其不结盟地位而进行的对话。

关于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的召开在恢复柬埔寨的和平和实现和解的进程中开创了新的前景。 停止干涉柬埔寨的内政，特别是在适当的国际监督下确实撤出越南军队，这将使柬埔寨的反对派放心，使持有各种信仰的柬埔寨人通过友好与信任的对话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将大大地推动上述进程。

乌弗埃－博瓦尼总统喜欢说，和平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和平高于一切，包括了所有一切，同发展不可分割开来。因此，如果世界只有一个地区享受着和平、生活在富裕之中，而其他地区却饱受战祸、深深地陷在日益扩大的贫穷之中，那么世界就不可能有和平。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工作，以便在和平最脆弱和遭受最大威胁的地方巩固和平，在和平遭到破坏的地方恢复和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终止我们许多人所面对的不平等和经济困难，从而使我们能够平等地享受构成发展基础的自由与和平的好处。

现在，我们对国际政治气氛的改善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改善将继续，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经济关系并没有出现同样的改善。

世界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日益扩大，北方经济继续发展、与南方经济的严重恶化形成显明对照，越来越富的北方与日益贫困的南方之间贸易失衡。 除其它原因外，这些由于原材料价格急烈下跌，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和沉重的债务负担所引起的。 债务负担归根结底意味着资金从南方向北方的净转移。

这种形势尤其令非洲国家担忧，他们面对着如此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困难，以至于他们逐渐建立起来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濒临崩溃的危险。 如果不采取大力措施使这些国家抵制这种倾向并至少能生存下去，他们将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混乱和不稳定，形成对确保其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和平的威胁。 我们有责任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在最近的法语国家首脑会议上，乌弗埃－博瓦尼总统解释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他说：

“饥饿的人没有自由，一个由于经济面临危险、债务负担沉重、贸易受到威胁及微少的资源受到无耻的剥夺而没有正常生活的国家，简言之，一个处于这种地位的穷国不是自由的国家。”

这确实是我们非洲今天的形势。 我们用昂贵代价所换来的政治独立和自由如果不是建立在真正的经济发展之上就失去了真实的意义。

确实，我们各国政府在最近几年中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并开始了宏大的改革计划，以克服当前的困难并进行发展。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果，我们的形势仍然危险地继续恶化。

原因十分简单。 我们生活在不友好的经济环境中，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自私，扩大的保护主义，以及某些人的唯利是图思想。 这些人可耻地仅仅通过投机买卖而更加富有。 这些人玩弄着我们英勇人民的劳动成果，并对他们的命运全然不顾。

这种投机买卖剥夺了我们需要资助我们发展的重要资金， 使我们不能实现对外诺言及在这计算机时代给我们的年青人提供知识、科学、技能和技术的训练，使我们成功地迎接不发达的巨大挑战并对建立一个较为公正和公平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贡献。

科特迪瓦在发展的道路上已阔步前进，我们通过自己进行的努力并得到了友好国家及国际金融和货币组织的宝贵援助。在这方面我们也受到了和平环境及其所带来的政治稳定的帮助。 但这一发展今天遇到了困难，我们在主要农产品的出口上由于投机买卖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下面我们要说的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对于在座的熟悉这个问题的人或在遭受其害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 我国三年内在这些商品上几乎损失了九十亿美元，说明这点也许能看清这个问题。 在同一时期内我国支付了六十多亿美元重新安排外债，因为必须暂停偿还外债。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还债，而是因为没有这种能力。发达国家在咖啡和可可这样的产品上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想到这一点我们有权力提问，我们在世界上试图建立的是什么样的具有正义的和平。

作为许多国际会议主题的痛苦的债务问题在这里的辩论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必须找到具有希望的解决方法，消除笼罩在特别受其影响的国家未来的不稳定因素。

我们认为债务是由于国际贸易不平等而造成的，必须在国际一级找出原因。

我们全面支持最近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倡议或计划中所包含的技术解决方法。他们的提出是由于对这一棘手问题努力思考并设法找到现实的、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的结果。 这些解决方法包括对一些债务的全部取消，对另外一些债务及其偿还的减轻、重新安排或部分取消，以及采取另外一些辅助措施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等收入的非洲国家，提供减让性的财政援助。

我们向已经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发达国家表示致意，他们已决定取消或减少一些发展中国家所欠的债务。

然而，我们认为对原材料采取公正价格的问题也应当给予恰当的重视。一个全球战略如果不能确保给原材料的公正报酬并保证其外汇收入的稳定以解决债务问题难到是可以想象的吗？ 我们大家都希望将要恢复的为在国际贸易中建立道德的南北对话应该考虑这一对我们这些国家至关重要的问题。

布伦特兰报告中所确定的持久发展的想法就是促进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 因此，它设想对于健康环境的关切将包括在发展过程之中。 这对于穷国和富国都同样重要。 因为如果不顾环境的恶化及生态平衡的破坏，发展是无法进行的。 因此，任何发展战略都必须同保护环境联系起来，以适应当前的需要同时又不给我们的后代带来危害。

将在１９９２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将提供一次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机会，使我们大家都会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在环境方面的国家和集体责任。科特迪瓦本着这种精神，在最高级的层次上参加了1989年3月在海牙召开的环境会议，并签署了会议通过的宣言。

毒品贩运是今天跨越国界的并威胁着青年人未来的又一个祸害，需要有一项与此进行斗争的国际战略，比如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在维也纳缔结的并递交给各国批准的《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中所确定的那种战略。反对毒品的现实斗争不应只局限于对贩运者和吸毒者采取更多的行动。 同时还需要鼓励生产者更多地致力于合法的、健康的商品作物的生产，使他们得到足够的利润以放弃种植致命的草药和植物。

在结束我的发言的时候，我必须提及今年６月２６日到７月１日在科特迪瓦首都亚穆苏克罗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之思想中的和平大会。这次大会有幸在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克·梅厄·扎拉果扎先生的倡议下召开。 教科文组织的章程在序言部分这样写到：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的心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不同背景、教育水平和信仰的人汇集在科特迪瓦共同审议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行动纲领，以达到有助于寻求和平与保卫和平的崇高目标;确定其纲领和必要的条件并使国际社会清楚地认识到和平是人类最宝贵的财产、人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是不惜任何代价地致力于维护和平。

会议的成果《亚穆苏克罗宣言》体现并表达了它们对于人类充满希望的未来的信念：我们必须根据对和平新的、全面的构想耐心地建设这个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每个政府和各国人民的行为都应该有效地保证以自由战胜压迫、以正义战胜不平等、以团结战胜自私自利、以尊重人权，特别是对生命权利的关注战胜对此种权利的背离、以共同的幸福战胜区域化的贫困，从而实现世界和平；简而言之，在一种健全的环境下，使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充分得到满足，最终解除人民对明天的担忧。

科特迪瓦准备为这样的和平，即所有人民心中的和平作出不懈的努力。

卡费先生（科摩罗）（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

衷心地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主席。大会选举你担任这个要职是对你这样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你的个人素质的赞扬。 大会也赞扬了你的祖国，我们的友好国家尼日利亚，以及它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所发挥的作用。 我祝愿你圆满地履行你新的职责，我们会给予充分合作。*

值此机会，我还要祝贺你的前任丹特·卡普托先生；他的专致、威望和能力使上一届会议得以有条不紊和积极地进行。 我还想借此机会毫不夸张地赞扬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为国际和平一贯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并做了有效的工作。

自从去年以来，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出现了对话和磋商的新时代。 这种缓和必将有利于世界和平。 同样令人鼓舞的是，这些积极的变化正在逐步开始缓解自从冷战以来普遍存在的不信任态度。 这种局势也标志着一种建立在增进相互理解和共同谋求和平解决办法基础上的新的语言。

然而，斗争远未完结，因为这种现象并非不可逆转。 所以我们要保持警惕，为了人类的利益确保这个积极的进程继续下去。因此，我们这个组织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只要出现无法通过对话来和平解决的冲突，我们这个组织就必须适当地注意这种问题。

在这些事态发展中，国际态势的变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所有国家遵守《联合国宪章》，同时铭记，一个国家集团，不论它有多么强大，都不应自认是世界的监护人，或者认为其他国家都只能是旁观者。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某些冲突正在得到解决和已经走上相对和平的道路表示欢迎；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在经济领域内还没有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尽管发达国家克服了它们的困难并经历了新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前景，但必须承认，

---

* 副主席弗罗尔森先生（挪威）主持会议。

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趋势使条件进一步恶化。 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加重了最贫穷国家向富有国家转移资源这一反常现象。 显然，这种情况在我国科摩罗尤其严重，因为它在当前国际经济局势中深受其害。 科摩罗是由分散的岛屿组成的一个小国，缺乏自然资源，这些都妨碍了我们的发展。 还有其它一些同样严重的因素，例如以亏损的价格出售我们的出口产品，或者这些产品不断贬值；不得不在世界市场上同合成产品竞争的香草、丁香、椰仁干和香料就是这种情况。 苛刻的投资贷款条件大大加重了公共债务，而且令人不安的人口爆炸、高失业率和财政赤字使我国严重依赖于外国技术和资金援助，这些都加重了局势的严重性。

为了使会员国更好地理解这些限制因素给我国经济造成的困难，我想说明一下我国经济总的状况。 刚刚独立的时候，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只有一个最简单的公路网。 科摩罗政府在艾哈迈德·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曼总统的英明领导下制定了我国向世界开放的经济发展政策。 当然，这只有在国际社会的资金援助下才有可能。 为此，１９８４年在我国首都莫罗尼组织了第一次捐助国圆桌会议。

在柬埔寨问题上，为了寻求和平解决而进行的对话进程应当继续下去。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表现出诚意，以便在该国恢复和平。

在中东问题上，我们痛心和失望地注意到局势仍然陷入僵局。 实际上，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打击的目标，一直遭受着最侮辱性的痛苦，其特征是严厉镇压、驱逐出境、破坏财产和炸毁房屋。我们继续强调，只要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不被承认和得到有效的行使，中东就不可能有公正、持久的和平。 在这方面，我们支持召开由所有有关方面，自然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的设想。

从以色列—阿拉伯冲突延伸出来的黎巴嫩局势仍然以暴力和痛苦为特征。 我们相信，现在是黎巴嫩充分恢复其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时候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支持国际社会寻求能够恢复和平并实现黎巴嫩全国和解的政治解决方法的努力—— 特别是三方委员会的努力。

至于伊朗－伊拉克冲突，我们欢迎两国在经过多年的痛苦和暴行之后停止了战争。我们规劝它们坚决保证参加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的以安全理事会第５９８(1987)号决议为基础的谈判进程。

我国与该地区所有其他国家一样，重申完全支持使印度洋成为一个和平区、一个非军事化的无核武器区的设想。 因此，我们支持１９９０年在斯里兰卡召开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国际会议的计划。

我在结束发言前必须谈谈一个科摩罗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极为关心的问题。自，然，我指的是科摩罗的马约特群岛问题。这一项目再次被列入大会议程。 我不想预测稍后阶段将对这一议题进行的辩论。 就目前而言，我将仅仅表示科摩罗人民和和政府对这一问题持续存在的深切关注，这个问题存在的时间太久了。 各位代表将同意我的看法，即这个问题应当获得符合整个科摩罗人民愿望的最终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曼先生在一项声明中说，他那次会议使得国际社会意识到我们的困难并导致对我们振兴我们年轻的经济的方式方法进行了透彻的审查。 这样，我国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基础结构。 其中包括逐步改进了道路系统，建立了一个深水港和提供了一个国际机场。 另外，为了改善公共资金采取了严明预算纪律的其他措施。

除了这些努力之外，中期经济前景和财政局势仍然令人担扰。 在此情况下，科摩罗政府决定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定一项结构调整计划，以便为更健全的经济创造条件。 国际社会在这一努力中的援助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我谨借此机会呼吁所有善良的人们—— 双边和多边捐助国和非政府组织—— 以提供支持我们调整计划所必需的财政援助的形式向我们提供宝贵的援助。

现在请允许我简单地谈谈国际政治形势。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由于有了导致各紧张地区缓和的更好的谅解，缓和正在几乎成为现实。 国际社会应当竭尽全力保持这些宝贵的成就。

在纳米比亚，独立与和平进程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的发展。 联合国应当保证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得到严格的贯彻，以便引导纳米比亚人民获得有尊严的国家主权。 我们强调结束种族隔离可恶制度的绝对必要性，以便在南非创造一个公正、民主、多种族的社会。

关于马格里布，我们欢迎该地区国家元首已经决定创造的缓和与合作气氛。 我们鼓励他们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我们相信这将为贯彻秘书长有关西撒哈拉的和平计划开辟有利的前景。

从阿富汗撤出外国军队远远没有停止那里的冲突。 我们必须支持联合国与有关各方一道寻求恢复该国和平的方式方法的努力。

至于朝鲜半岛，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希望南北两个朝鲜将通过对话坚持为国家的统一而努力。 我们仍然认为，允许两个朝鲜加入联合国将是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因素。

希望“国际关系中的缓和之风能够对这个问题产生有利的影响。”

我们希望，在法国与科摩罗之间建立的国家元首级对话能够导致以法律和正义为基础的令人满意的解决。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支持科摩罗人民的努力，直至其正义事业取得胜利。

在进入本世纪最后十年的前夕，我们仍面临着许多艰巨的挑战。

不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整个人类需要在处理它所面临的一大堆问题时，充分发挥其想象力。显然，这样做要求人类更加团结，更加公平地分享资源和知识——这是能够有效保证世界和平的唯一条件。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联合国应当充分发挥作用，因为它仍是反对产生冲突的过度和辱骂行为的唯一堡垒。

我国政府再次庄严重申，它将致力于实现《宪章》中规定的和平与正义理想，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支持联合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要提醒各位，按照大会第３４／４０１号决定，第一次答辩发言限于１０分钟，第二次限于５分钟，各代表团应当从各自的席位上发言。

加雷汗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巴基斯坦高级部长表示希望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我国代表团对此完全有同感。我国总理已反复宣布，与我们的所有邻国，包括巴基斯坦和平、友好地相处是印度政府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因此，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勉强地对巴基斯坦高级部长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所作的发言行使答辩权。１９７２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签署的《西姆拉协议》为通过双边谈判和利用和平手段解决两国间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了基础。因此，我国代表团对巴基斯坦高级部长在这一论坛上提到所谓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感到遗憾。

哈克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巴基斯坦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查谟和克什米尔是有争议的领土。因此，我们坚持认为需要按照联合国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并本着有关协议的精神来解决这一问题。

下午６点４０分散会。